

价值·公正·和谐

黄 华

摘 要: 价值、公正与和谐均有着深刻的历史底蕴,包含着丰富的理论营养并为历代先贤所践行,从西方文明到东方传统,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国孔子、老子无不关注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及其程度。当下,我们面临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融合、价值多元化、利益分化、矛盾普遍化及冲突常态化等尖锐矛盾。笔者认为,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确立社会公正价值的至上性,才能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 价值;公正;和谐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0)6-065-03

作 者: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117

作 者: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项目(09JD710053)

一 价值之一般

哲学中的“价值”一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value, value 一词源于梵文中的 wer(掩盖、保护)和 wal(掩盖、加固)。从词源学角度看,“价值”所关涉的事实景象是人的生命安全、健康之类的活动,它既包括物的属性还包括人的主观感受。回溯人类早期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我们不难理解大凡对生命存在及其活动起维持和保护作用的或有益于其生命健康的,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价值作为范畴最早存在于经济领域,大至与经济学研究物质的稀缺性有关,因为稀缺,所以具有价值,在经济学中,它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间的社会关系。而后,价值范畴逐渐运用到哲学、理论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中。在哲学领域,李德顺先生在《伦理》中将“价值”界定为“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与主体尺度是否相一致或相接近。”^①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价值最基本的特质是人本性。万物的价值及其等级和秩序均是按照人的需求来排列的,客体依价值主体而定。此外,李连科先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价值来源于客体是因为客体或外部世界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具有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属性,但客观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人不能单纯依靠自然的恩赐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实践活动去创造。尽管物质有许多属性,但它只不过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非价值本身,而只有将主体的活动纳入客体的属性之中,客体才产生价值。价值产生于实践,是指价值既不单纯来源于客体,也不单纯取决于主体,而产生于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之中。在人

类实践过程中,为了实现价值,主体和客体都需要克服各自的片面性,互相联系、相互补充,当主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客体时,一方面将产生人化对象物,创造出肯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则可能出现对主体的否定,创造出否定的价值,即负价值。^②

其实,价值问题一直是中外思想家苦于探寻的重要话题。在西方的哲学史中,毕达哥拉斯开创了对价值研究的先河,他认为价值的本质是数,正义是价值平方数,足见其对正义的重视。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柏拉图则认为价值是理性的本质,“善的理念”是至高无上的,“善”是各种理念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宇宙的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价值存在于人的兴趣,万物都有自身目的,至善是一切事物的最高价值,其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有同出一辙之处。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价值,快乐是最高的善,而感受是判断善恶的标准,他论道:“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尽管其追求快乐的观点会引发人们及时行乐的联想,但其对人感受的尊重与推崇却是人本思想的萌芽。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神学所统治,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上帝是最高的价值,苦行、对上帝的追求、对来世的向往是最大的价值,显然这种思想窒息了人们的创造性和自然性的能力。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举起了自由与平等的大旗,主张提高人的地为和尊严,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自由。康德反对古代伊壁鸠鲁派的幸福主义和近代利派的利己主义,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个人欲望的满足当作行动的最高伦理原则,因而不能明确判断行为的善与恶,因此他认为:人们行为的善恶、道德与否,只能从行为动机来评价,决不掺杂任何感性上的好恶、趋利避害的因素以及对行为后果的任何考虑,若如此则可称之为“善良意志”。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西方近代以前的价值哲学是以伦理为中心,围绕道德领域的善、恶、幸福等问题展开论述的。我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成于先秦而立于汉代,并在历代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受到儒家思想熏染。孔孟的“仁学”和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价值问题的精辟论说。

于此,价值内涵是随着时代演进而嬗变的,但总体看,价值反映的不外乎是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求这一社会关系。在这组关系中,价值的主体是人,人是价值判断的当然尺度与依据;价值的客体是包括自然之物和上层建筑在内的客观实在。价值的基础是主体的需求,但主体的需求受特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当价值的命题引入哲学领域,它注定要提出并解答以下问题:世界的存在及其意识对于人的意义如何?如何看待人的需求?如何确立价值评价标准并实现价值创造?

二 价值论域下的社会公正

公正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古往今来,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史长卷上,几乎每一页都写着公正的名字。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伦理学家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公正的内涵与实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思想家们就对公正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公正,在古希腊雅典人那里就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生活的中心位置。著名的梭伦改革就是以公正为原则和支撑的。即在贵族和贫民之间不偏不倚,“拿着一支大盾,保护西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柏拉图将公正列于“四主德”之首,置于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德性之上。德谟克利特首次对此四类德性进行系统论述并认为公正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顺从必然规律,按照必然性(理性)而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指各尽自己的义务,服从城邦的利益,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公正理论,他不仅首次区分了公正的不同学科归属,将个人公正归于伦理学的范畴的同时,将城邦的善即城邦公正归入政治学的范畴,他还用“数量相等”和“比例相等”来解释公正的内容,他指出:“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比例,出现了多或少。”^③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把公正加以神化,其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认为在人的国家之上还存在着神的国家,并且神的国家统治着人的国家。他进而认为正义并不能在用于人类社会的“世俗法”中找到,只能在上帝的“永恒法”中存在。因而,人们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才能找到正义获得拯救。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以全新的视角阐释公正的内涵,自由、平等、权利成为正义理论的中心命题,并逐渐形成了以契约论为代表的社会公正论。近代社会契约的真正创立者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大思想家霍布斯,在他看来:在社会状态之前,有一个自然状态阶段。在此状态中,人们出于自己的利己本性行事,“人对人像狼”互相斗争。为了避免这种状态所造成两败俱伤,理性的人们在自然法的启示下制定了体现正义、有利于人们和平共处的社会契约,此后英国的哲学家洛克以及法国的大理论家卢梭分别从社会契约论及国家体制的公正问题使契约论的精髓广泛传播。值得提及的是与卢梭生存在同一时代的英国哲学家休谟,他亦试图从社会领域寻找正义的客观基础。但他作了不同的阐释,他论道:从表面上看,国家产生于契约……但从本质上看,任何契约都是着眼于人类利益的一种发明,而这个发明的第一动机以及履行这种义务的最初动机都是私利,由此形成了他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论,该理论此后还得到了边沁及穆尔的补强论证。就现代的西方学术对正义的解读,大多集中民主政治、经济自由与天赋人权三方面。

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要通过公正原则来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罗尔斯反对一些人为了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反对为了大多数人享有更大利益而迫使少数人做出牺牲,从而达到防范和限制多数人的暴政而丧失必要的社会公正。哈耶克和诺齐克则坚持个人主义传统。他们认为,社会公正的集中体现就在于给每个人在市场竞争中以自由选择的机会;每个人在竞争中机会均等,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同时,他们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的权益是不可侵犯的,不能将公正理解为牺牲个人或少数人利益

而促进整体的利益,如果对个人权利和利益横加干涉就会失去社会正义。哈氏和诺氏的理论不仅与自由市场的精神密切契合,而且将个人与集体、个体与整体首次以同等重要的角度予以关注。麦金泰尔是后现代主义正义论的代表,他认为,自由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的方面,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从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应当认为,在当今文化多元、价值多元而全球化、一体化步伐加快的社会大背景下,麦金泰尔的理论对于拥有不同文化、价值背景人们的融合与共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我国社会公正思想的演进而言,最早见于《韩非子·解老》中:所谓直者,义务公正,心不偏私也。意为为人要正直,行为处事不偏不倚,不含私心,以天下为怀。其后孔子提出:“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善均之贫,和无寡,安无倾”,墨子主张“兼相爱”,勾勒出一个令人向往的“爱无差等”的公平理想社会;老子认为公正蕴含包容性、全面性、同一性、合乎历史规律性等特点,正所谓:“容乃公,公乃全”(《老子》十六章)、“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老子》五十六章);^④董仲舒则从“大富则骄,大贫则忧”的思考出发,提出圣者应“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到了宋王安石,他推出改革变法,主张抑制豪强,与董仲舒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纵观我国传统社会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大多通过或受“义利辩”的影响予以阐释,在较高层次上而言,公正就是要循理遵道,即维护天之道、天之理、自然的法则;对于个人而言,在则义、利方面要以义立身立德,求天下之公义、舍身成仁、去利求义,反对循名逐利、见利忘义。正所谓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然而,正义的事业远未完成,有关正义的思想与实践还在不息地演进,到了近代,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农民朴素的公正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继而提出用“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其民生主义就是要均贫富,使人人都有平等的地位去生活。到新中国在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受马克思公正正义观的影响及结合中国的实际,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的社会公正观丰富了人类公正思想的宝库并且为人类社会的公正作出了而且正在作出独到而富有成果的贡献。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⑤社会的公正,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公正就是使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义务能够得到保障的制度规范体系,是社会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时的公正化程度和状态。^⑥首先,社会公正是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社会公正以介于功利与超功利之间的中庸重性,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可。正如我们所认知的,一个社会不能以功利主义为基本的价值观,如果那样,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冲突,碰撞,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动荡,使个人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当然一个社会也不能以超功利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基础,因为这会导致一些人专门履行义务,另一些人则专

门享受权利,一些人专门牺牲、奉献,而另一些人专门享受别人的牺牲与付出的局面,要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引入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其次,社会公正立足于利益关系的调节,能通过合理的利益协调来实现个人利益需求的满足。因为社会公正正是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利益维护为出发点的,其主旨在于通过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的协调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它主张通过恰当地分配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使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实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此外,社会公正还是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依据,制度是社会中最为核心的规则体系。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需要有基本的价值理论作指引。在现代社会,这个基本价值理论就是社会公正。脱离了社会制度来谈社会公正,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他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

三 社会公正之于和谐的社会价值

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他认为作为本原的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和比例,就产生了和谐。“和谐”是哲学中的根本范畴,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探讨了理想国的公正原则问题,提倡平等与社会秩序和谐。他论道:理性的德性是智慧、意志的德性是勇敢、欲望的德性是节制,只有用智慧、意志控制欲望始可创造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谐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和”成为人们甚至一个国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它对国家的发展、人际关系的优化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和谐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企图以“中庸之道”化解之,提出了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思想,以求社会矛盾的缓和,进而促进社会和谐。老子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产生的状态,他言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⑦毛泽东、邓小平等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和谐思想的内涵,并促进了我国和谐事业的发展。2005年,胡锦涛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而把有关社会和谐的理论与实践推向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公正与和谐社会都具有相对性,而且均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当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实现公正与和谐,此外,公正与和谐都是社会关系的范畴,

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无法绕开社会公正而进行的。(1)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我们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然要追求分配公平以控制两极分化,因此分配正义构成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内核;(2)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下我们建设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体系中,公正价值取向具有本源性、基础性并贯穿系统价值之中,失之其它价值便会荡然无存;(3)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首要原则,尽管当下诸多的社会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若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与化解,就会成为普遍性,突出而又深化的矛盾,只有以社会公正为首要原则,在克服道德风险的同时公正分配社会利益,方可防范社会秩序的混乱,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正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拓展,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变动加快、阶层利益关系趋向多元、人民内部矛盾出现常态化。“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只有实现社会公正,整个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反之就会如康德所言:“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⑧康德对公正必要性和至上性的呼唤,表达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追求。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下我们致力于社会公正的建设必将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

注:

- ①李德顺:《价值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 ②李连科:《价值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 ③亚里士多德:《政法学》,吴寿涛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4页。
- ④转引自刘白明:《略论老子的公正思想》,《求索》2008年第10期,第121-122页。
- ⑤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 ⑥宋增伟、王默忠:《制度公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理论探讨》2008年第5期,第34-36页。
- ⑦肖苇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 ⑧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5页。

(责任编辑:南 桥)

(上接93页)

习’外,确实还有别的东西可寻!”^⑥而中国传统音乐思想,礼乐“和”一直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的音乐审美观,没有遵循音乐独立存在的特殊价值规律,连仅有的一点道家自然的天人“和”音乐观也是作为音乐家的自我修身养性,逃避政治世道的精神慰藉。不难发现贯穿中国几千年的音乐审美观“和”渗透着道德伦理与政治思想的制约使得中国音乐美学思想早期成熟固定,后期缓慢滞后。

注:

- ①②③④ 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12、113-143、143-166页。
- ⑤李泽厚:《美学三书》2007年版,商务印书馆,第147-152、191-196页。
- ⑥ 亚瑟·叔本华:《叔本华文集》2008年版,中国戏剧出版社第136页。

(责任编辑:南 桥)